

莎士比亚论稿

阮坤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莎士比亚论稿

阮 珅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八月

序

或有问于余曰：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难不难？余应之曰：又难又不难。说难，是因为现代中国人研究古代的、异域的莎士比亚，研究他用转型期的中古英语写成的作品，当然很难。有些词语英国学者也茫然不得其解，何况中国人？而且他的传记材料保存至今的又很少，研究其人其事，谈何容易！说不难，是因为几百年来英美和世界其他国家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和专著不可胜数，可说是硕果累累。中国人在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钻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应该说是不会难的，甚至可以像英美学者一样做莎剧文本的校勘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从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俄文专业调到英文教研室，讲授英国文学史，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当时英文刚“解冻”，到处还买不到莎士比亚原著和英文莎评著作。老英文系的藏书，在1953年院系调整时，几乎百分之百都调到中山大学去了，只剩下几本大学英语教材。我教英国文学史，文学参考书却付之阙如。幸好武汉书市上，进口俄文书有的是，还可以通过国际书店向苏联订购。我订购了《莎士比亚全集》俄译本和苏联莎学者的莎学论文集。读后做了大量札记。就凭一叠叠的札记写成讲稿和论文。七十年代末，武大外文系和华师、武师中文系三家出资联合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季刊，我兼任编委。此后，未避“利用职权”之嫌，将拙作莎评稿交编委会陆续在季刊上发表。

莎学研究有广阔的园地。对任何一个“志愿者”来说，都大有可

为。歌德赞赏推崇“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就是“评不尽”，“研究不尽”。即使孜孜不倦，殚精竭虑，也难穷尽莎士比亚本人的主观世界和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深厚底蕴；即使“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也看不完全世界的莎学书。我们可以也只能在广阔园地的一角致力于耕耘，不问收获。但可以肯定，收获总会有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这里扼要谈谈几个“角”的问题。

一、解读角

研究莎士比亚，首先要透彻理解原文。要联系上下文、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等等对文句作出正确的解读。不人云亦云，不以讹传讹。试举一个鲜为人注意的例子。国内外有些莎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第42首十四行诗和《维罗纳二绅士》结尾凡伦丁要把情人让给朋友的道白，表明莎士比亚持有“友情重于爱情”的观点。这全然是想当然的曲解。我在《莎士比亚第42首十四行诗注疏》一文中，对这种曲解进行了批驳，并联系莎士比亚其他悲喜剧中有关描述，对他的爱情观作出了阐释。这篇论文曾在1996年洛杉矶世界莎学大会上宣读，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誉。我从洛杉矶回国后，十四行诗讨论小组召集人、美国莎学专家、威斯康辛大学希瑟·杜布罗(Heather Dubrow)教授给我寄来一封“感谢信”。信中说：“I'm writing to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seminar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Your paper raised important issu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love and friendship in the sequence and hence w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meeting. ... Thank you again for helping to make this session so successful.”来自大洋彼岸的溢美之辞，使我且感且愧。

我手头还有一些曲解莎文的例子。如《麦克白》第二幕第三场，门房谈到乡下人因久盼丰收陷于绝望而自缢身亡。英美一些注家硬

把门房这句不牵涉任何典故的话同1606年粮食丰收谷价暴跌的史实扯在一起,作出错误的解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 the gentle sin(温存的罪过)被注家牵强附会地解释为“gentlemen 必犯的错过”。诸如此类的解读,难道不需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匡谬吗?(参见拙文《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总序》)

二、翻译角

这一角与解读角有密切的关联。等值的好翻译来自对原文的透彻的理解。我们所期待,所要求的等值的莎译应是忠实地再现莎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译文。我们不片面地强调意译或直译,而全面地强调意译和直译的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精深的语文素养,要下扎实的工夫。在这个角里,翻译者、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大有文章可做。如何“以诗译诗”,如何以汉语音组律或其他诗体移译莎剧素诗体?如何在移译莎剧中的双关语、头韵或其他艺术手法时,使中译文达到形神兼备的高度?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探索。

三、校勘角

文本校勘不是什么极端深奥的学问,只要我们把校勘和解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地进行版本考证,就能去伪存真。英美学者辑编的莎士比亚全集,所在多有,但对莎剧不同版本的异文,甚至某些文句排列的顺序、位置,很少进行修订。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推敲、值得商榷、有待订正的文句。以《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为例,第一、第二四开本和对开本中的“sleaded pollax”(沉重的长柄斧),从上下文和情景来看,是合乎情理的用语,但一些新版本都作“the sledded Polacks”(乘雪橇的波兰人),就近乎“乖谬”了(参见拙文《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总序》)。又如《结局好万事好》第五

幕第五场末尾有一句话“我可见你活着！”许多莎剧全集原文版本都把这句话排作海伦娜的台词。我查了〔英〕1957年牛津版、〔美〕1973年哈丁·克雷格与截维·贝文顿合编修订本、〔美〕1974年河滨版、〔英〕1985年柯林斯版，无一例外。其实，从剧情来看，这句话应出自老伯爵夫人之口。我对英美版本的疏漏感到“若有所失”，于是带着一种“求同”心态查阅俄译本（《莎士比亚全集》八卷本，第五卷，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50版），终于找到了“同调”。我便大胆地在我的译稿上作了修订，把英美版本误置的台词归于老夫人名下，并加了一个注（见拙译《结局好万事好》，《新莎士比亚全集》诗体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莎学专家，《新莎士比亚全集》诗体译本主编方平先生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认为我这一改动“完全合情合理”。

从以上所述看来，中国人无论从哪个角去研究莎士比亚，只要锲而不舍，都不是不能做出成绩的。有志于“踏莎行”者，盍兴乎来？！莎士比亚在第146首十四行诗中号召人们“利用闲散时光换取不朽”，意思是要人们多写作，多研究，多出成果。让我们为此作出努力吧。

2005.12.12. 于广东江门五邑大学

黄炳礼博士楼302室

目 录

序	1
《威尼斯商人》简论	1
奥瑟罗的性格	12
略谈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	24
莎士比亚真伪辨	34
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	38
印度人和犹太人——莎士比亚作品考偶拾	66
福斯塔夫和欧尔卡苏——莎士比亚人物考偶拾	69
《还是印度人好》一文质疑	73
夏洛克的性格及其他	78
哈姆雷特的性格和行动	85
莎士比亚的形象思维初探	92
大鹏和云雀——李白与莎士比亚比较举要	103
《威尼斯商人》与《论犹太人问题》	117
苏联莎学史论辑要——兼谈“中间状态”问题	127
Merry 风流——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正名	137
莎士比亚在中国	145
中国最早的莎评	148
《李尔王》与《草原上的李尔王》	151
杜甫与莎士比亚比较举要	167

译莎小记	177
世纪的历程——莎剧改编演出评论丛抄	180
《莎士比亚作品赏析》序	186
《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总序	188
《哈姆雷特》导读	194
《罗密欧与朱丽叶》导读	202
《威尼斯商人》导读	208
《仲夏夜之梦》导读	216
《麦克白》导读	223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导读	229
《亨利四世》导读	237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导读	245
《维罗纳二绅士》导读(中译本前言)	252
《结局好万事好》导读(中译本前言)	260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导读(中译本前言)	269
《亨利八世》导读(中译本前言)	278
中华莎学述评	286
“踏莎行”词六首	307
附录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Du Fu and Shakespeare ...	309
A Note on the Opening Lines of Sonnet 42	320
121	《王尔李博士履草》已《王尔李》
131	樊举对出亚出士著记甫甚

《威尼斯商人》简论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第一创作时期(1590 - 1600)的作品。在这个时期里,莎士比亚主要是写喜剧和历史剧。一般说来,他的喜剧表现了他对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历史剧表明了他反对封建战乱、主张国家统一的进步观点。《威尼斯商人》这出喜剧则概括地显示了作者当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因此,它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威尼斯商人》的文章,大都分析了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本文不打算对这个剧本作出全面论述,仅就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磅肉的矛盾的解决、夏洛克为犹太人“请命”和揭露公爵的两段道白以及莎士比亚是否同情夏洛克等有争议的问题,扼要地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一

莎士比亚在喜剧创作初期,只是乐观地看待一切事物。由于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观察社会生活,他对现实的认识也就不断深化。到写作《威尼斯商人》的时候,他痛切地感到人道主义者所奋力追求的和谐友爱的理想原则遭到了践踏,便以自己的创作去揭露现实中的矛盾,同时坚持不渝地维护他的理想。他把矛盾的揭露和理想的阐发结合在一起。为了昭示理想原则,必须揭露现实矛盾,在揭露现实矛盾中挾伐阴暗面,就可以更好地昭示理想原则。这是莎士比亚创作思想上的转变,或者说是一大进步。

莎士比亚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主张人性解放,人性自由,反对一切否定人的价值、损害人的尊严、压抑人性、违反人情的不人道现象。

莎士比亚论稿

《威尼斯商人》正是在这方面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看法。剧中两条主要线索——一磅肉的故事和三个匣子的故事，相互穿插，交织出作者的主旨，人物道白包含着作者的深刻寓意。《威尼斯商人》通过两条主要线索，反映了旧法统同人道主义原则的矛盾和冲突。莎士比亚在反映矛盾和冲突中毫不含糊地对旧法统进行了强烈谴责。

在三个匣子的故事中，旧法统同人道主义原则的矛盾表现为世俗礼法同人性的对立。对立双方是“父与女”，确切地说，是“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和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一幕二场）^①。作者通过鲍西娅的形象化的语言宣告了反钳制的斗争：“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同上）。尽管反钳制的斗争是在遗嘱所规定的“猜匣为婚”的钳制下进行，但结果毕竟是鄙弃虚荣（金匣、银匣象征虚荣）的质朴真挚的爱情（以铅匣为象征）取得了胜利，这是“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三幕二场）所钳制不了的。

在一磅肉的故事中，旧法统同人道主义原则的矛盾表现为法律契约同人情的对立（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着重论述）。透过矛盾的描绘，作者和盘托出了自己对人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法。莎士比亚赞扬人们慷慨好义，乐善互助，和衷共济，友好相处，反对人们怀着贪婪的心理，使用残暴的手段，见利忘义，谋财害命。人道主义者总是以仁爱、友谊相号召，以此来消除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恶行，并力图以人道慈悲的原则来改造“人对人是豺狼”的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他们积极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应低估。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一磅肉事件的矛盾双方的褒贬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在剧本开头，就强调指出安东尼奥和巴萨尼

^①本文引用的剧中人物的道白，均根据朱生豪译本。

奥两人的深情厚谊。当后者把心里的打算告诉前者时，前者慨然允诺说：“只要您的计划跟您向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一幕一场）。后来巴萨尼奥对鲍西娅极力称赞安东尼奥的为人，说他是“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热心为善，多情尚义，在他身上存留着比任何意大利人更多的古代罗马的侠义精神。”（三幕二场）高利贷者夏洛克则截然相反，他毫无恻隐之心，硬要按照契约从债务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因此，萨莱尼奥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家伙，样子象人，却一心一意只想残害他的同类。”（同上）葛莱西安诺在法庭上指着夏洛克的鼻子骂道：“万恶不赦的狗……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你的性情正象豺狼一样残暴贪婪。”（四幕一场）莎士比亚对矛盾双方一褒一贬。褒的是一个最仁慈的人安东尼奥，这是正面人物，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贬的是一个样子象人、豺狼成性的夏洛克，这是反面形象，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对立面。

应该指出，莎士比亚不可能象我们今天的读者一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不会对商人和高利贷者作进一步的阶级分析，他也未必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这一类经济学上的概念。他想到的只是安东尼奥轻资财，重友谊，慷慨正直，宽厚仁爱，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夏洛克重利盘剥，不仁不义，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因此，他是根据人道主义原则，而不是根据阶级划分的原则来决定褒贬的。

有些评论者谈到，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冲突，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①。这是从题材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冲突这个题材本身顺理成章地给

^①见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第78-113页；朱维之：《论〈威尼斯商人〉》，《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1978年9月），第19页；陈悖：《〈威尼斯商人〉选场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67页。

莎士比亚论稿

今天的读者展示出这个矛盾。换句话说,这是作品题材的客观意义所在。但从作者的创作思想即作者的主观意图来看,剧本所表现的是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对立,是人道与不人道的对立。作者主观上决不是要反映阶级斗争或剥削阶级的内部斗争。十分明显,在作者的笔下,夏洛克要割安东尼奥一磅肉,不是“狗咬狗”,而是狗咬人,是“万恶不赦的狗”咬“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

人道主义者以“超阶级”的面貌出现,他们心目中的人和人道主义原则都是“超阶级”的。我们应该指出他们心目中的人和人道主义原则以及人道主义者本身,实质上一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新兴资产阶级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成为进行“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积极力量。莎士比亚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家,必然要以自己的作品赞美这个力量,并鞭挞所有阻碍这个力量前进的罪恶势力,包括束缚商业发展的高利贷在内。他在《威尼斯商人》中褒商人而贬高利贷者,正表明他的思想和创作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时代要求。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今天所作的阶级分析抹煞或贬低他当时的进步思想,说他“美化了商业资产阶级,对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并无补益”^①。相反,对当时起进步作用的商业资产阶级加以“美化”倒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结构是不无补益的。

二

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不止于一褒一贬。从剧情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深刻用心,在于通过夏洛克同安东尼奥的冲突反映法律契约同人情的对立。安东尼奥是“跟一个心如铁石的对手当庭质对,

^①见前引陈惇文,第68页。

一个不懂得怜悯、没有一丝慈悲心的不近人情的恶汉”(四幕一场)。而这个恶汉是以契约为后盾的。摆在莎士比亚面前的问题是：要尊重法律契约，就违反了人情；要尊重人情，就得蔑弃法律契约。作者于是向旧法制提出了挑战。他的战斗激情通过一磅肉的故事情节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在三个匣子的故事中，莎士比亚也利用人物道白强化他批判旧法制的激情。不仅鲍西娅联系亡父的遗嘱非难“冷酷的法令”，而且巴萨尼奥在选匣子的时候也对法律进行了抨击：“在法律上，那一件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三幕二场)

随着戏剧冲突进入高潮，莎士比亚的批判也进入了高潮。他因势利导，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威尼斯的统治者。夏洛克手里有契约，心里有数：契约是神圣的，谁也不能违背或改变契约的规定。因此他气势汹汹，一定要照约割一磅肉。他在法庭上踌躇满志地说：“我现在但等着执行原约。”(四幕一场)夏洛克有恃无恐，就因为统治者、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必然要维护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契约。这一点，安东尼奥也知道得很清楚。他说：“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倚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三幕三场)鲍西娅也在法庭上宣称：“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四幕一场)变更或取消既成的法律，就是变更或取消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法律契约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必须维护，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夏洛克才敢于同公爵争辩，敢于反驳公爵关于慈悲的说教，并单刀直入地揭穿他购买奴隶、虐待奴隶的底细(见四幕一场)。夏洛克辩驳的意思是：公爵可以蓄奴，他就可以要求割一磅肉，两者应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反唇相讥，充分揭露了统治阶级法治的实质。莎士比亚让公爵大讲人道慈

莎士比亚论稿

悲,以反对夏洛克的残暴不仁,又通过夏洛克的辩驳,来撕破这位统治者的人道主义伪装。作者的社会批判是何等深刻有力,艺术手法又是多么圆浑自然!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着重描绘了家庭婚姻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在作者主观上是要表现人道主义原则与旧法统的对立,而在客观上则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文艺复兴时期是资本主义力量与封建势力新旧交替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崭露头角,但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其意识形态仍然在各方面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资产阶级要革故鼎新,彻底战胜封建势力,建立起新型的统治,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较量,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从《威尼斯商人》中可以看到,在商业社会里,封建势力仍在猖狂地施展它的淫威。三个匣子的故事中,不言而喻,鲍西娅父亲的遗嘱就是封建幽灵;一磅肉的故事中,高利贷者夏洛克无疑是封建剥削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的阶级地位不同于商人安东尼奥。因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①,高利贷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一种剥削形式。还有威尼斯公爵,这位统治者类似古希腊城邦中的工商奴隶主,也类似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他同夏洛克一样进行封建剥削,一样的不人道,但他同情安东尼奥,而且口头上起劲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并不奇怪,他的两重性是为他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当时政治上是商人和贵族的联合统治,以公爵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同商业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这种联盟同租地农场主(包括“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一样,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②联盟的“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下,第818页 ^②同上,第811页。

族(就象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普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①贵族的生产资料已“变为现代私有财产”,“与资本合并”,其经济利益同商业资产阶级一样,有赖于商业的繁荣。“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②经济利益的一致,使威尼斯的贵族和商人结合在一起。剧本提到,劝说夏洛克放弃控诉的,有“二十个商人,公爵自己,还有那些最有名望的士绅”(三幕二场)。可见贵族和商人对一磅肉事件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他们的一致,他们的联合并没有改变贵族本身的封建实质。由于贵族在经营上仍保存着封建剥削形式,因此商人和贵族的联合统治就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其法制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程度的封建性。法律容许购买奴隶,就足以说明一切。可以认为,当时的法律是商人同贵族实行妥协的产物,还没有形成纯粹的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法制。

前面说过,莎士比亚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念,他只是以人道主义为准则,去衡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给以肯定或否定,善则褒,恶则贬。不过在我们看来,他谴责重利盘剥的夏洛克和蓄奴的公爵,恰恰是谴责封建势力,谴责当时法制中的封建因素。这就雄辩地说明了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莎士比亚在批判旧法制的同时,力求建立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法治,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法治。

有的同志说:“莎士比亚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法治,因为‘剧中的戏剧冲突最终还是靠法治来解决的’^③。这个看法,我们未敢苟同。首先应该看到,当时资产阶级法治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建立起来,莎士比亚正是要促进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因此谈不上否定的问

①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③见前引陈悖文,第70页。

莎士比亚论稿

题。其次,戏剧冲突通过订约、愆约、诉讼和法庭裁判这样一些情节逐步深化,是为剧本的题材和主题所制约的。事实上,作者也不可能脱离当时法治的现实环境,去安排包括法庭裁判在内的一些情节。诉诸法治是为了揭露法治,批判法治。再说,戏剧冲突最终并不是单纯“靠法治来解决”,而是靠法治加人道来解决的。四幕一场法庭上的判决最能说明问题。鲍西娅援引威尼斯的法律对夏洛克从严作了判决,接着公爵本着基督徒的人道精神从宽发落,安东尼奥作为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不念旧恶,又本着宽厚精神提出处理意见。作者最后不是一成不变地根据鲍西娅援引的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安东尼奥的补充意见来解决戏剧冲突的。

莎士比亚观察到旧法制同人情的矛盾,但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的道路。他提出的“济世”办法是法治加人道,或者说,以慈悲公道作为法律的补充,这就是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开出的“人性论”的药方。判决前,公爵和鲍西娅都极力劝说夏洛克,指望他对安东尼奥大发慈悲,后来他们对不接受开导的狠毒的夏洛克作出判决时,也显示了慈悲。“慈航普渡”,人道主义者确是一片苦心!鲍西娅还鼓吹,“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同上)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莎士比亚所追求的法治精神。总之,法治加人道,实质上就是莎士比亚除封建之旧,布资产阶级之新,为资产阶级提出的理想的法治原则。

三

既然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痛加针砭,为什么又把揭露统治者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个反面人物?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既牵涉到作者的时代条件,也牵涉到他的性格描绘的艺术。

先谈谈时代条件。莎士比亚在他的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曾经痛心指出:“官府钳制着艺术的喉舌”。统治者只许人们歌功颂

德,不许直言时弊。老百姓不能随便议论朝政,作家也不能在作品中任意揭统治者的疮疤。由于形格势禁,莎士比亚的创作都是利用旧题材,利用古代或外国故事反映英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威尼斯商人》也是如此。作者借夏洛克之口揭公爵的老底,是有其苦衷的。一方面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另一方面,以恶人出恶言的形式出现,不致开罪于官府。曹雪芹写《红楼梦》不就是托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吗?他还无限感慨地赋了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寥寥二十个字,充满了愤激哀怨之情。对于莎士比亚,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理解。

再谈谈莎士比亚的性格描绘的艺术。莎士比亚总是多方面地在发展中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是他对戏剧发展史的杰出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莎士比亚以高度的评价。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不是僵死的,干瘪的,就在于他从各方面显露出自己的性格。夏洛克不只是贪婪残暴,虚伪狡诈,而且有“机智”,反应快,尖刻毒辣,能言善辩,善于玩弄唇枪舌剑攻击对方。这些性格特点不断地发挥作用,使他能够咄咄逼人,得逞于一时。坏人并不都是等着挨打的草包,他们有他们的头脑,会想他们的坏主意,出他们的鬼点子,发动猖狂的进攻。在同他们交锋的时候,不能小看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人物语言是作家描绘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夏洛克揭露公爵时声色俱厉地说:“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让你们的法律见鬼去吧!”(四幕一场)夏洛克口之所言,表明他心之所想:如果法律不是骗人的东西,它就应该成为奴役人、剥削人的保证,应该成为杀人的东西,即应容许他割安东尼奥一磅肉。在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的“慷慨陈词”,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他的阴险狠毒的性格。

夏洛克的另一段为犹太人“请命”的道白(见三幕一场),也应该这样看。莎士比亚让夏洛克讲这段话,同样是出于描绘人物性格、塑